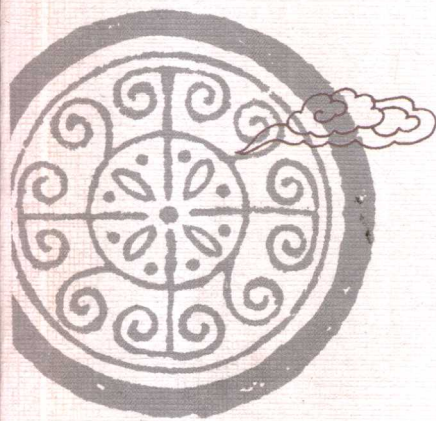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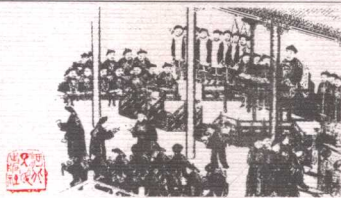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黄爱平 著



朴学与清代社会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朴学与清代社会

黄爱平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朴学与清代社会/黄爱平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1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ISBN 7-202-03052-7

I. 朴… II. 黄… III. 考据学-研究-中国-清代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738 号

书 名	朴学与清代社会
丛 书 名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
著 者	黄爱平
责任编辑	王苏凤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曹玉萍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76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02-03052-7/C·75
定 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序

陈祖武

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日趋繁荣，学术史研究一如众多相邻学科，愈益引起学者关注，喜呈方兴未艾之势。其间，不惟若干有分量的断代专题论著陆续问世，而且贯通数千年的成卷帙作品，亦纷纷酝酿。行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刊布的《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便是这样一套通古为史的崭新力作。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近二十年间崛起的优秀中青年学者，学风严谨，成就斐然，业已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中坚。他们充分发挥一己的学术专长，彼此交融，相得益彰，形成强劲的群体优势，从而赋予丛书以厚重的学术分量。丛书上起先秦，下迄明清，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学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演进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成功梳理。深信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当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永葆青春，显示了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所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这样一个生命力是如何获得的？值得我们去深入探

讨。结撰《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各位教授，以他们的学术实践表明，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把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路径揭示出来，恐怕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方向。祖武为学也晚，近二十余年间，一直以阅读学术史文献为每日功课；摸索中国古代学术与古代社会独特的演进途径，始终是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只是秉性迂拙，为学不勤，虽迭经寒暑而未得要领。如今，喜见诸位年轻朋友锐意求新而后来居上，不禁为之由衷敬佩和欣慰。借此机会，谨就平日读书之一得，敢与丛书的各位作者唱为同调。

研究学术史而与社会史相结合，这是治中国学术史的前辈诸大师为我们树立的一个好传统。钱宾四先生是中国学术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卓越的示范。继《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宾四先生又推出另一部重要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这部论著所提出和讨论的诸多问题中，“乾嘉经学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经学中人以一趋于训诂考索而有乾嘉学派之谓？钱宾四先生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似梁任公先生同名论著之辟为专题讨论，但真知灼见，则每在字里行间。关于这个问题，钱先生之所论，在如下几个方面，尤称创获。

第一，清代学术与宋明学术是一个后先相承的整体。钱先生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即指出：“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自序》。）循此以进，宾四先生将论学的重点摆在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先生说：“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当始于宋？

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钱先生之所论，高屋建瓴，准确地揭示了从宋学到清学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了论究学术史，必须实事求是地梳理学术源流的道理。

第二，清代的考证学，渊源乃在明中叶以降诸儒。在讨论清代考证学渊源时，钱宾四先生不赞成简单地用王朝更迭来断限。一方面，钱先生既肯定清初诸儒若顾亭林、阎百诗等对乾嘉学术的深刻影响，指出：“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另一方面，宾四先生又否定了以顾亭林为汉学开山的主张。他说：“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术、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闻，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且所失者胥其所重，所取胥其所轻。取舍之间，亦有运会，非尽人力。而近

人率推亭林为汉学开山，其语要非亭林所乐闻也。”

惟其如此，所以钱宾四先生认为：“清儒言考证推本顾、阎者，乃以本朝自为限断，亦不谓其事由两人特造，更无来历也。”至于这个“来历”，钱先生则以《四库总目》和乾嘉通儒焦循之所论为据，直溯明中叶以降诸儒杨慎、焦竑、陈第、方以智等。他说：“清廷馆阁词臣序清儒考证之学，亦谓沿明中叶杨慎诸人而来，不自谓由清世开辟也。”又说：“里堂在野，亲值汉学极盛，推溯来历，亦谓起明季，与四库馆臣之言相应。”钱先生的结论是：“此自清儒正论，谓考证由顾、阎开山，其说起晚近，按实固无据也。”（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第三，把握学术消息，不可脱离社会历史实际和环境变迁。钱宾四先生就此指出：“自乾嘉上溯康雍，以及明末诸遗老。自诸遗老上溯东林，以及于阳明。更自阳明上溯朱陆，以及北宋之诸儒。求其学术之迁变，而考合之于世事，则承先启后，如绳秩然，自有条贯。”（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将学术变迁与社会历史的演进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规律，这便是钱宾四先生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为学方法论。

就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而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具体做了三个方面的剖析。

首先，是对经学考古之风与八股时文关系的论究。在这个问题上，钱先生以宋学中人姚鼐、李兆洛之所论为据，指出：“是皆以清代汉学为激起于八股也。”继之又引王昶为惠栋所撰墓志铭而阐发云：“此亦以乾嘉经学发轫，针对当时之时文应举言也。”最后则据江藩《汉学师承记》所述而得出结论：“谓

乾嘉经学考古之风为有激于举业，固清儒之公言矣。”（同上书上册，第四章《顾亭林》。）

其次，是对理学不振缘由的探讨。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宾四先生辟出专章，通过李绂学术的论究，以觐一时理学盛衰之根源。对于李绂学术之历史地位，钱先生评价甚高，认为：“以有清一代陆王学者第一重镇推之，当无愧矣。”在回顾李绂一生浮沉宦海，几度濒于不测的遭遇之后，钱先生指出：“穆堂之在圣朝，得保首领已万幸，尚何高言践履功业！谢山深悲之，曰：‘公平生以行道济时为急，用世之心最殷，故三黜而其志未尝少衰，浩然之气亦未尝少减。然而霜雪侵寻，日以剥落，菁华亦渐耗。’又曰：‘公有万夫之稟，及中年百炼，芒彩愈出。岂知血肉之躯，终非金石，竟以是蕉萃殆尽。’嗟乎！是可谓深识穆堂之志气遭遇者矣。（原注：汤潜庵、全谢山遭遇皆至酷。）如是而言义理、经济，几何其不折入于训诂考据之业者！”正是以李穆堂学行的梳理为典型事例，钱宾四先生遂得出一明确之认识，“清学自义理折入于考据”，实为历史之必然。（同上书上册，第七章《李穆堂》。）

再次，是论证清廷的政治高压对学术发展的严重桎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首章，钱宾四先生即提出“学术流变，与时消息”的主张。对于明清更迭之后，清廷政治高压予学术的恶劣影响，钱先生尤为关注。他就此指出：“康熙以来，清廷益以高压锄反侧，文字之狱屡兴。学者乃以论政为大戒，钳口不敢吐一辞，重足迭迹，群趋于乡愿之一途。”（同上书上册，第一章《引论》。）该书第十一章，在讨论龚自珍及晚清政论之复兴时，钱先生再度指出：“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蘖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人。”

由嘉道而反观前此近二百年之清代前期历史，钱宾四先生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遂得出“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的答案。钱先生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同上书下册，第十一章《龚定庵》。）

先师杨向奎拱辰先生，早年问学于钱宾四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享九十高年而将宾四先生之学术发扬光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拱辰先生撰文论清代初叶学术有云：“结合清初社会实际而谈学术思想，这是最正确的方法之一。我们不能脱离实际社会而谈社会思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与当时之社会相关。”（《清初学术思辨序》）二〇〇〇年七月廿三日，先师走完一生之奋斗历程。辞世前未久，拱辰师向学兄李尚英教授回顾数十年之为学追求，再度指出：“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杨向奎学述·关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的研究》）

本钱、杨二位大师之教，谨以上述一孔之见奉政于《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的诸位著者和编辑先生，并请读者诸贤赐教。

目 录

《中国传统学术与社会丛书》序	(1)
----------------------	-------

第一章 理学的衰颓与实学的兴起	(1)
-----------------------	-------

一、江河日下：理学的衰颓	(1)
--------------------	-------

二、波澜壮阔：实学的兴起	(16)
--------------------	--------

第二章 实学的嬗变与朴学的发展	(40)
-----------------------	--------

一、阎若璩与胡渭：从实学到朴学的转变	(41)
--------------------------	--------

二、惠栋与吴派学者：朴学的确立	(50)
-----------------------	--------

三、戴震与皖派学者：朴学的高峰	(60)
-----------------------	--------

四、阮元与扬派学者：朴学的总结	(73)
-----------------------	--------

第三章 朴学的衰微与经世思潮的崛起	(89)
-------------------------	--------

一、门户纷争：朴学与理学的冲突与调和	(89)
--------------------------	--------

二、另辟蹊径：今文经学的复兴	(107)
----------------------	---------

三、挽救危机：经世主张的出现	(131)
----------------------	---------

第四章 朴学与清廷文化政策·····	(157)
一、实学的兴盛与清廷文化选择的确立·····	(157)
二、实学的衰落与清廷高压政策的推行·····	(170)
三、朴学的发展与清廷文化政策的调整·····	(189)
第五章 朴学与清代哲学·····	(206)
一、实学思潮激荡下的哲学思考·····	(206)
二、考据学中的义理探索·····	(226)
第六章 朴学与清代史学·····	(247)
一、经世风尚与清初私家修史的勃兴·····	(247)
二、考据学风与乾嘉考据史学的盛行·····	(275)
第七章 朴学与中西文化交流·····	(302)
一、经世致用与西学东渐·····	(303)
二、回归传统与“西学中源”·····	(325)
主要参考书目·····	(357)
后记·····	(367)

第一章 理学的衰颓与实学的兴起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许多思想家学者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设计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学术思想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风格千变万化，内容丰富多采。他们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共同汇成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洪流，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崭新的篇章。

一、江河日下：理学的衰颓

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理学产生并逐渐兴盛起来，成为宋明时期学术界的主流，统治阶级的官方正统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学术发展的重要环节，宋明理学在其产生、发展乃至兴盛的过程中，经历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两个

阶段。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把儒家伦理观念本体化、神圣化，将其提高到“天理”的地位，并用理论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确立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准则。而直承陆九渊一派的王阳明心学则以其“致良知”学说，把“吾心之良知”和“天理”合而为一，进一步完成了封建伦理天然合理永恒至上的理论论证。但是，心学这种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在推进理学发展的同时，也为其本身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理论体系的崩溃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由于王学的“心”及其本体“良知”全在于个人的“好恶”，并无一个确定的是非标准，“致良知”的途径又只是“顿悟”或“渐悟”这两种功夫，这就使得王学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异端色彩，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冲破朱学束缚，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乃至出现其后“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学派^①；另一方面则为虚无主义思想和空疏学风的大肆泛滥打开了闸门。沿及王学末流，更进而走向极端，一味主张现成“良知”，鼓吹只要从“心悟”入手，便可解决一切问题。他们不讲经世，不读群书，只知言心言性，造成一种清谈空疏的社会风气，从而使心学走入末路。

在心学泛滥、空谈盛行、学术危机日渐严重之时，明王朝的统治也日益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之中。皇帝昏庸，宦官专权，财政困难，吏治腐败，统治机器运转失灵；土地高度集中，自然灾害频仍，农民生活困苦不堪，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东北满族政权崛起，势力迅速强大，威胁日益严重。大明江山已然摇摇欲坠，病入膏肓。如何扶危定倾，是晚明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然而，只知高谈“明心见性之空言”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

的王学，不仅不能挽救危亡，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士子空言心性，不务实学，“高者谈性天，纂语录，卑者疲精毙神于八股，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刑名钱谷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学”^①。官吏则以国计民生为卑俗，视典章制度为糟粕，“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乃至“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②。明王朝的统治大厦，最终在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坍塌。

严酷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学术思想界的觉悟和警醒。一时之间，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成为众矢之的。许多学者在反思明朝灭亡原因的同时，对空疏的学风予以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事实上，早在晚明，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察觉到心学的弊害，开始对风靡一时的空疏学风进行批评。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顾宪成、顾允成极言讲学之弊，认为“今之讲学者，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而所讲之事又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大抵“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③，不过如此而已。高攀龙揭露心学空言心性，蠹国害民之弊：“始也扫闻见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废学，于是乎《诗》、《书》、《礼》、《乐》轻而士鲜实悟；始也扫善恶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废行，于是乎名节忠义轻而士鲜实修”^④；并直斥腐儒“不通事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⑤。复社成员黄澍也批评当时官吏士子不务实学，不通

① 李埏：《恕谷后集》卷九《书明刘户郎墓表后》。

② 李埏：《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举书》。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六十《东林学案三》。

④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上《崇文会语序》。

⑤ 高棅等撰：《东林书院志》卷五《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上》。

世务：“毋论天文斗宿，地脉龙蛇，通灵遐光，元声大律之书未曾梦见，即昭彰如漕马盐茶，按部如九边图塞，星列棋布如丘塍图甲，揭鼓如屯铸，烂陈如孙、吴、诸葛兵法，持一往叩，东支西吾，如拾败芟于零霜，丐残羹于覆鼎，纵有所得，皆出弃余。又矧嗜欲营营，本原淆混，生殷忧逼仄之时，希俸于优游福胜之事。怀此道也以往，即奈何欲佐圣主成唐虞三代之治乎？”^① 经世派的代表陈子龙则毫不留情地揭露当时整个知识界弥漫的空疏学风，尖锐地指出：“俗儒是古而非今，文士撷华而舍实。夫抱残守缺，则训诂之文，充栋不厌。寻声设色，则雕绘之作，永日以思。至于时王所尚，世务所急，是非得失之际，未之用心。苟能访求其书者盖寡，宜天下才智日以绌，故曰‘士无实学’。”^② 这些来自社会上和学术界的激烈批评，敢于直面社会现实，痛陈曲学误国之弊，热切呼唤经世实学，事实上已然开启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先声。

清代初年，伴随天崩地裂的社会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经世、救世呼声的高涨，许多思想家学者从现实和理论的反思中，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判。无论是出于自身学派的反省，抑或是来自其他派别的攻击，整个学术界不约而同，掀起了一股批评心学乃至宋明理学的思想潮流。

黄宗羲，蕺山哲学的传人，其学远绍王守仁，近承刘宗周，本属心学派别。但在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大变化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学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逾越了心性之学的藩篱，而且对心学乃至理学的空疏学风予以了深刻的

① 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黄澍序》。

② 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陈子龙序》。

批判。他批评明末空言讲学之风，认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①。正是这种清谈空疏的学术风气，造成了晚明儒学的变异与堕落。黄宗羲对此痛心疾首，他说：“奈何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②又严厉指责理学末流徒“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闢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之阔论铃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③。这些鞭辟入里的批评，深刻揭露了理学末流空言心性、不切实务，最终误国误民的弊害，为转变明末空疏的学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确，与黄宗羲同为刘宗周的及门弟子。他批判的锋芒所向，直指程朱理学。理学家极力尊奉表彰《大学》，特意把该篇与《中庸》一并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分别为之作《章句》、《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而《大学》一篇，位列《四书》之首，理学家不仅将其归之于孔子、曾子名下，而且尊之为承载表述孔门一贯相传心法的代

① 全祖望：《鮑培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②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杂文类·留别海昌同学序》。

③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碑志类·赠编修升玉吴君墓志铭》。

表作。陈确敢于向理学权威挑战，他公然否定《大学》是孔子、曾子的作品，认为：“《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他尖锐地指出：“《大学》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窅于禅，其词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终信为孔、曾之书，则诬往圣，误来学，其害有莫可终穷者。”对朱熹解《大学》“格物致知”宣扬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的说法，陈确直斥为荒诞虚妄，“去禅弥近”，他说：“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在陈确看来，《大学》“显然非圣经”，程朱理学家又“为《大学》所误，因自误误人”，而后世学者尊之信之，甚而曲学阿世，“敢于诬孔、曾而不敢议程朱”，遂使圣人之道日渐湮没，因此，他专作《大学辨》一篇，“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①。毫无疑问，陈确对《大学》的考辨，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家的批评，为学者冲破理学桎梏，解放思想，转变学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毛奇龄，作为清初王学后劲，他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改造王学的同时，对理学及其代表人物朱熹予以了激烈的批评和彻底的清算。他斥责理学家自诩的“道学”“本于老氏”，源于道教，实“道家之学”而非“圣学”，并追本溯源，直揭“道学”的来历：“逮至北宋，而陈抟以华山道士自号希夷，与种放、

^① 《陈确集·别集》卷十四《大学辨一》。